

论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理念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张 勇,覃卫国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国 60 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和合”的精神理念、“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等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髓在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较好诠释。

关键词: 中国政府; 对外援助;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8008(2012)03-0055-04

新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展开的。建国伊始,我国即对蒙古、朝鲜、越南等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政府也在不断调整对外援助的对象和重点,但援外行为从未中断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厚度和经验广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成熟的西方援助”。^{[1]4}这对于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伴随而来的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为何建国初期在本国人的肚皮尚且不能填饱的状况下,中国会不遗余力甚至不惜代价地去援助别国,是什么理念在背后支撑着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日趋务实,又为何在自身仍是受援国的现实下不仅继续坚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展开力所能及的援助,而且也开始对发达国家进行人道主义的灾难救助?本文认为,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理念不仅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敏锐观察和判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与熏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得到扬弃和发展,对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至今仍产生着深远影响,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古老而极富生命力的传统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

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2]14}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深深地根植于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之中,对外援助的理念也受其熏染而独具特色,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

一、“和合”的精神理念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在西周时期思想家史伯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即是强调万事万物之间只有“和合”统一才能生成新的事物。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则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显然孔子非常崇尚以“和”为价值标准来治理国事、制定礼仪。古人以“和为贵”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最高准则,所谓“协和万邦”一说即是明证。先秦诸子百家之后,和谐思想逐渐渗透到历代封建社会的各思想流派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被普遍认可的人文精神。

“和合”的精神理念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这一理念的精髓,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将这“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3]165},并一再宣称“中国共产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

收稿日期: 2012-04-0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0B187)

作者简介: 张勇(1976-)男,湖北荆门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教授。

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3]256}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一边倒”外交政策下的对外援助,还是“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政策下的对外援助,或是70年代到80年代初“以苏划线”的对外援助,其目的都是借援助为手段,“反对美帝”“反帝反修”“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总之,任何一个国家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因素时,中国总是高举反抗旗帜,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为此甚至不惜承担起超过自身实力的对外援助义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3]530}

朝鲜战争爆发前不久,毛泽东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趋势还是较为乐观的,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4]15-16}战争爆发伊始,中国即明确表示“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3]150}在美国政府置中国的再三警告于不顾,悍然侵入朝鲜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国家利益,保卫世界和平,经过艰难地抉择,最终做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决策。不难看出,援助朝鲜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以战争制止战争,最终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对全世界人民呼吁“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3]171}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仍然是当今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终极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认识更加清晰准确,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2005年胡锦涛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主张,这是对邓小平论断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刻概括。“和谐世界”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它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互利共赢理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新时期的对外援助工作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政策主张,是实现“和谐世界”的重要手段。在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于世界上爆发的局部战争中正义的一方,不再进行直接的军事援助,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人道主义的救助。对于个别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中国政府则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以舆论的手段加以反对和制止。这也正契合了中国传统“和”文化中的以“不争之争”而达“不战屈人”的智慧,以非战争的方式维护正义,促进和平。纵览当今世界,如中国一

样综合国力快速增长时期仍一再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并不多见,这也雄辩地证明了传统的“和合”文化思想对当今中国外交的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哲学观念应以“和”为中心,“进一步强调‘收敛锋芒、善与人同’的‘和为贵’思想为未来中国外交的哲学思想重心。”^{[5]48-49}

二、“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即道义,“利”即利益,两者究竟孰轻孰重,一直以来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总的来看,传统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还是以“义”为主,主张重“义”轻“利”。孔子即主张“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则强调“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则应该先“义”后“利”,即所谓“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当然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义利观,并非完全漠视利益,而是强调不可“以利害义”“见利忘义”。“君子爱财”,但要“取之有道”。即使孔子本人也毫不掩饰自己“求富”“恶贫”的观点,承认“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重利轻义”观念,并不反对“逐利”行为,而是主张在不违背“义”的前提下,追求正当合理的利益。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在自身国力尚不充实的情况下,对朝鲜、越南实施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援助,无不体现着危难时刻“义”字当头的传统观念。中国共产党坚信自己在为两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而战,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义准则,即使在一定上因援助行为损害本国的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并愿意为此承担巨大的民族牺牲。诚然,正如当时政府的宣传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样,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主要出发点是出于维护本国国家利益,但传统的道德观念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绝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3]137}

援越抗美是新中国历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军事援助行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从中得到的国家利益与付出的巨大牺牲是不相称的。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更多的是从道义出发,认为兄弟国家之间应该互帮互助。即使在70年

代初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时期,中国也未对美打出越南牌,不拿原则做交易,不愿舍“义”取“利”。在1971年底签署的《中越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承诺将始终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决心抗战到底,中国人民决心支持到底。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早已做好了各种准备,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6]1971年至1973年也成为中国对越军事经济援助最集中的时期,金额超过90亿元人民币。^{[7]162}

如果说对亚洲邻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与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那么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援助,则更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重义轻利”的传统义利观。当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遭到英、法的武装侵略时,中国政府以非常强硬的态度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坚决地支持埃及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行为,并积极地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和1000吨牛羊肉以及6000吨豆类的经济援助。此后不久,中国方面又将大量的粮食、钢材等物资运往埃及。毛泽东对埃及驻华大使说的一番话可谓感人肺腑:“(中国)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3]249}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工作逐步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显得更为成熟理智,愈加重视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不再对第三世界国家“有求必应”,而是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方针,变单纯的对外援助为“有出有进、有给有取、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强调援外工作要建立在援助国与受援国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对过去的对外援助工作进行了深刻地反思。1980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认真做好援外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过去)对外提供援助没有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特别是对一些重点国家承担的任务过重,不注意经济规律,浪费比较严重。”这一对外援助政策的改变,并非只顾自己发展而放弃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实际上作为

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从未忘记过那些正与贫困作斗争的不发达国家,邓小平在会见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的时候指出“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尽管自己发展了,还是要把自己看作是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忘记全世界所有的穷朋友……中国将来发展了……还是把帮助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8]江泽民也提出“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了,或者因为我国的经济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而忘记穷朋友,更不能看不起穷朋友。”^{[9]551}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较大冲击,但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大国的国际责任,对全世界公开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东南亚国家渡过经济危机,这种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是一脉相承的。

三、“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

仁爱思想如一根红线贯穿儒家学说始终,是中国传统道德所推崇的最高精神境界。“仁者爱人”即要求事事不能只顾自己利益,而应有“恻隐之心”,要关心、体贴、同情他人,不能做损人利己之事。要做到“仁”,就要“克己复礼”。“克”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是说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学会换位思考;二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是说君子应成人之美,善于谦让。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其主旨在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帮贫济困、富于爱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深深地渗透到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国家外交政策中。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因为自己已经取得独立和解放而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袖手旁观,而对这些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示了深深地同情,时刻关注着他们正义的斗争事业。1963年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动情地说“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就是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给予的帮助不大。再过五年、十年,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给予的帮助可能多一些。”^{[3]491}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绝大多数正在进行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亚非拉国家提供了无私援助。特别是在50、6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先后有23个国家得到了中国的援助。我国对外援助的对象全部集中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在遭受外来侵略的国家,因为“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3]256}对于受

援国,中国从不颐指气使,而是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对待,也决不允许本国援外人员在别国胡作非为,享受特殊待遇。毛泽东曾关切地询问一非洲访华代表团“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3]491}

1964年中国政府提出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如“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10]388-389}

新中国成立后,在自身面临着恢复与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的同时,积极地进行对外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除要求受援国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外,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体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文化精神。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不断加大,其中人道主义援助的比例日益增加。印度洋海啸、美国飓风、巴基斯坦地震、日本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政府均在第一时间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继续向贫困国家提供经

济和物质援助,如对朝鲜、尼日尔、赞比亚、布隆迪、莫桑比克、莱索托等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却对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他国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之时,我们总是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向陷入困境中的国家慷慨解囊,体现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仁爱精神在当代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参 考 文 献:

- [1] Deborah Brautigam. Chinese Aid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Exporting Green Revolution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 [2] 李宗桂. 中国文化导论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3] 毛泽东外交文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 [4] 毛泽东选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 [5] 门洪华. 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 [J]. 教学与研究, 2005, (4).
-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 [N]. 人民日报, 1971-11-27(1).
- [7] 薛谋洪, 裴坚章. 当代中国外交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8] 邓小平. 中国将来发展了仍属第三世界 [N]. 人民日报, 1986-6-22(1).
- [9] 江泽民.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 杨 强】

An Analysis of Foreign Ai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Concep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Factors

ZHANG Yong, QIN Wei-gu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an abundant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beliefs, by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osed foreign aid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Confucian beliefs, such as the ideology of "harmony" and "unity", "valuing loyalty over gains", "manhood", etc., as the cor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fully displayed and well interpreted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oreign aid policy.

Key word: Chinese Government; Foreign Aid; Traditional Culture